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方克立

方克立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FANGKELI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方克立

方克立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FANGKELI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克立文集/方克立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814-5

I. 方... II. 方... III. 哲学—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166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张良一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方克立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875 插页 8 字数 505 000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6-1814-5/B·55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本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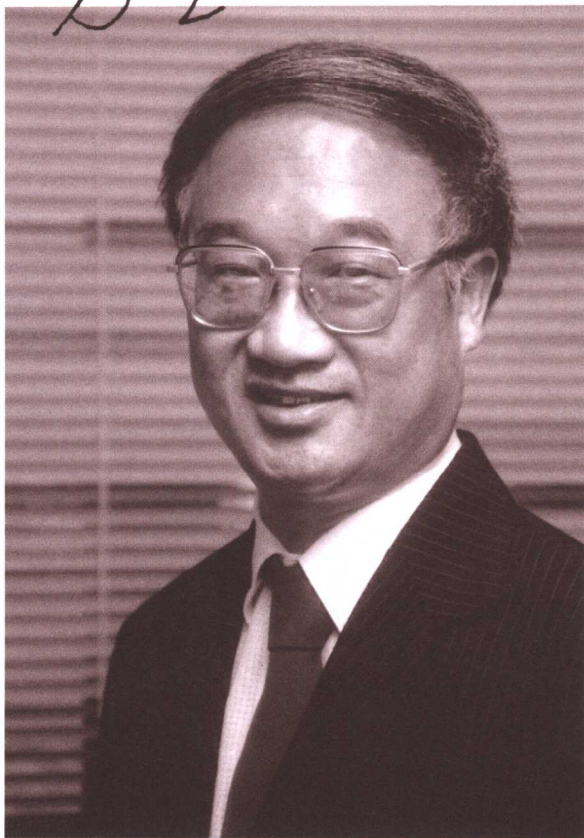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方克立



方克立

小传

方克立,1938年6月生,湖南省湘潭县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年留校任助教。1973年调到南开大学哲学系。1979年晋升为讲师,1981年升任副教授,1984年由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2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2000年8月离任。曾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天津市社联副主席、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暨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给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开过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范畴通论、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国文化概论、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等十余门课程。1982年以来,已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36名,他们大都已成为各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主编

《中国哲学大辞典》(1994)、《中国文化概论》(1994)、《现代新儒家学案》(1995)、《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1998)等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的思想文化现象和评析当代思潮,与张岱年先生一起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方针。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曾多次到美国、法国、德国、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考察,2001年在北京成功主办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任大会主席,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之一。90年代主要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提倡“严谨治学,高尚做人”、“学行并重,德业双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均取得显著成效。

在我国第一个教师节,《高教战线》1985年第9期发表《乐在开拓研究教书育人中》一文对他进行报道。1997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有对他的专题采访。《中华英才》1994年第19期、2000年第21期也有专文对他进行介绍。

方克立学术思想述要(代序)

曹 娟

方克立教授生于1938年6月,湖南省湘潭县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年留校任助教。1973年调到南开大学哲学系,1979年晋升为讲师,1981年升任副教授,1984年由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4年2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2000年8月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40年来,方克立教授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开过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范畴通论、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学概论、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思潮等课程。1982年以来,他已指导培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35名。他们大都已成为所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方克立在大学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40年来,他的学术工作的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分析历史上的思想文化现象,观察和处理现实的思想斗争和中国文化

发展问题。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在回答新儒家的质疑时坦然陈辞：“正如有些真诚的儒者是把儒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一样，对于我和许多与我同辈的大陆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早已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学问’，成为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实践原则。”^①这种坚定的学术持守及其所体现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在场的海内外学者的尊重。

下面对方克立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概要的评述。

关于《周易》与孔子研究方法论

1962年3月16日，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方克立用笔名“方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一文，批评李景春等学者在《周易》研究中经传不分，混淆了《易经》和《易传》思想的不同时代性。他认为：“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时，把《经》和《传》严格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把它们分别放在自己的时代中，分别解剖它们的哲学体系，才能认清《易经》和《易传》哲学的本来面目，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规律解开一个重要的纽带。”同年9月14日，李景春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回应以《研究〈周易〉哲学应当以〈传〉解〈经〉》一文。这场讨论不光涉及《周易》经传关系问题，更主要的是，它涉及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质性的方法论问题，就是我们在用现代语言去阐释古代哲学思想时，如何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避免把古人现代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挂在古人名下的现象发生。方蠡指出，在李景春先生的论著中，“《易经》作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对立统一’、‘矛盾转化’、‘量变质变’、‘根本质变和部分质变’、‘肯定否定’、‘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等辩证法的规律。事情如果

真是这样,那么一部中国哲学史就难得写下去了”。李景春否认这一批评,认为他已对现代辩证法规律和古代的辩证法因素作了如同“太阳”和“烛光”一样的区分。这场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哲学研究》1963年第1期发表了东方明的题为《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其有害的方法》的“学术评论”,批评李景春在《周易》研究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名下”的错误做法。该刊从1963年第2期开始特设“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栏,陆续发表了李景春、冯友兰、任继愈、阎长贵等学者的讨论文章。方蠡在第3期发表《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一文,举出15条资料证据,说明在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确实存在着把古代思想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挂在古人名字下的倾向,并就这个问题从哲学史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四点原则性的意见:

第一,在分析古代哲学思想时,应该从直接占有的可靠材料出发,从古人的思想实际出发,不要把最初的萌芽的东西夸大成为完善的成熟的东西,把可能由之引申和推衍出来的结论和论断强加给古代思想。

第二,在运用现代哲学语言去解说古代哲学思想的时候,应该力求全面准确,不要随便把古代的哲学范畴“意译”为不恰当的现代哲学语言,把现代哲学命题任意附会在古代哲学思想上面。

第三,研究古代哲学思想,切切忌讳的是望文生义、无中生有的方法。这种方法会为所谓“抽象继承法”大开方便之门,而其直接后果是歪曲历史的本来面貌(伪造历史),糟蹋祖国的哲学遗产。

第四,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来评价古代哲学家,既不随便非难古人没有提供出他们所不可能提供的思想,也不

盲目颂扬古人，把古人所不可能提供的思想硬挂在他们的名下。

这场讨论以李景春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发表《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而告终。

20世纪60年代初在《哲学研究》上开设的“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栏，后来扩大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专栏。方克立在该刊1963年第4期又发表《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一文。他不同意冯友兰先生把孔子的“仁”说成是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并且竭力论证这种“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还不完全是欺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真实的”。方克立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必然有其时代的内容并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要制造关于超阶级性的幻想，完全是为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以抽象的、普遍性形式表述出来的思想并不是没有阶级性的”。冯友兰先生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回应以《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一文。方克立又在该刊1963年第6期、1964年第1期先后发表了《实质的分歧是什么？——答冯友兰先生》和《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吗？》两篇文章，就上述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其中涉及对马恩著作中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思想家的自我欺骗和分工”等论述的理解。方克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编造出来的‘共同利益的幻想’。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们在考察历史运动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思想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把历史描述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迭相更替的过程。他们把事情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像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

指出的,‘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他不同意冯友兰先生把孔子的“仁”抽象化,并指出“抽象继承法”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在他看来,马恩的“普遍性形式”说一点也帮不了冯先生的忙。

冯友兰先生是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领域的权威学者,方克立在以后40年的学术研究中也多次论及冯友兰。1993年,针对某些台港学者对冯先生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而从政治上和道德人格上对他所作的攻击,方克立在《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一文中,对冯友兰终生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促进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坚持“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爱国主义立场,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评价。1995年,在《全面评价冯友兰》一文中,方克立认为,冯友兰的哲学道路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缩影。“通过冯友兰哲学这面镜子,可以反映或折射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和社会实践特别是政治变迁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篇文章在充分肯定冯友兰一生的哲学贡献的同时,也批评了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歪曲成“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主张用“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来取而代之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关争论至今没有停止。

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60年代在学术界初露头角的方克立,在连续参加了两期农村“四清”运动后,接着又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学术工作也因此而中断了十余年。80年代初,他以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而开始重新活跃于学术界。

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方克立配

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专题研讨会,他用笔名“岳华”写的会议纪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同年3月,他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接着他又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现实意义》、《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鸿篇巨制——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评介》等文章。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也以范畴辞条数量多和内容详实为一大特点。方克立在南开大学首先招收培养了一批“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83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哲学范畴研讨会上,他带四名研究生出席会议并且都发表了论文,南开大学哲学系也成为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重镇之一。

关于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意义。方克立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范畴热”,是起因于一部分哲学史工作者不满足于过去那种“列传体”、“四大块”、“两军对战”的简单化的哲学史研究模式,力图探索一条通过哲学范畴史的研究,来揭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进程、各民族理论思维的特点和诸哲学系统的深层逻辑结构的新路。它的终极目的不仅是为哲学的繁荣和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建设,而且也是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促进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服务。他强调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作了几点论证:第一,把哲学史当作认识史,研究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规定的任务。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写出一部通过范畴的逻辑演化而充分展开的哲学史,但是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它是一个方法论的宝库,研究我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同样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研究

认识史、范畴史的指示和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的党性原则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本身就是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蒲鲁东等人的批判,对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原则的唯物主义改造,都给我们指出了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道路。方克立认为,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逻辑)的内容,而且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探索道路。毛泽东对“知行”、“矛盾”、“事物”、“实事求是”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就给我们提供了用适当的民族形式来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榜样。

方克立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指导,系统地清理了中国哲学史中的“知行”范畴,全面考察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哲学家关于知行难易、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分合等问题的辩论,特别是对宋元明清时期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各种具有典型形态的知行学说,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他高度评价王夫之在批判一切“离行以为知”的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认为它“是较无片面性弊病的,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知和行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产生以前,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水平”。知行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方克立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革命阶段的每一次重大转变,总是要把认识论问题突出出来,因为革命的指导者总是首先要解决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孙中山正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才提出了革命的“心理建设”的问题,写了《孙文学说》一书。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是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为了清

算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而写作的。他对知行范畴的考察,没有走入思想的纯粹逻辑推演之一途,而是力图通过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1984年,方克立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获天津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天津市评选委员会在“评语”中说:“该书撰写之初,就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来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作者始终坚持这一宗旨,不为前些年出现的一股怀疑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所动摇,表现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

除了“知行”范畴之外,方克立关于“体用”范畴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他认为“体”和“用”是最足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特点的一对范畴,在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中都找不出一对与它的涵义完全相当的范畴来。他首先考察了体用范畴的由来,否定了“体用本乎释氏”、“出自西来佛书”之说,指出在先秦文献中已有体用并举的提法,到魏晋时期,“体”和“用”已成为一对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本体论范畴,并成为魏晋玄学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玄学体用观对后来的佛教哲学和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他准确地厘定了体用范畴的涵义,指出它的本义是指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后来才发展、衍生出了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的意义,并探讨了从前者演变到后者的轨迹。除了这两种基本涵义之外,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还有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未发与已发、常住性与变动性等多种涵义。再次,他考察了在体用观上错综复杂的哲学斗争,指出围绕着什么是体、什么是用的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而在体用关系问题上,强调体用统一的辩证观点也同“体用殊绝”的形而上学作了坚决斗争。方克立认为,有体有用、体用统一

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用这种朴素辩证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但不容否认,传统哲学体用观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对于在中华民族认识史上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体用范畴,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区分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其中包含真理性的部分,把它熔铸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中去。

方克立后来发表的评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文章^②是对体用范畴研究的深化。除了对“中体西用”论与“西体中用”论的产生背景和政治、文化内涵的揭示之外,他还指出二者都超离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的涵义,不是讲一个事物有不可分离的“体”和“用”(不论是实体和属性,还是本质和现象)两方面,而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之间来讲体用关系,把它们讲成是一种本末或主辅的关系。这种把体用“打成两橛”的做法,正如严复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甚不通”的“牛体马用”论。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的精义就在于体用统一、“体用不二”,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都陷入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折衷主义。

关于现代新儒学研究

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围绕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各派观点展开了热烈的争鸣。除了名噪一时的“新启蒙”、“西体中用”、“彻底重建”诸说之外,方克立还注意到有一派主张“复兴儒学”或“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观点,在当时虽未成为主流但已在中国大陆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1986年3月,他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一次科研咨询会上作了题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